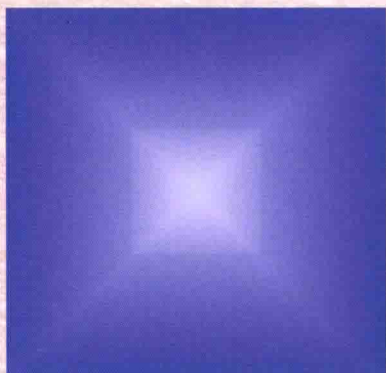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Shi Lun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李宗刚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Shi Lun

李宗刚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李宗刚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209-08786-5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1129 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李宗刚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23.5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8786-5

定 价 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531)82079112

目 录

上篇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

绪论 战争语境下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003)
-----------------------------	-------

第一章 晚清文学改良	(015)
------------------	-------

第一节 新派诗与诗界革命	(016)
--------------------	-------

第二节 新小说与小说界革命	(024)
---------------------	-------

第三节 新文体与文界革命	(030)
--------------------	-------

第四节 梁启超小说观念建构的内在逻辑	(034)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学	(043)
--------------------------	-------

第一节 消费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	(043)
-----------------------	-------

第二节 韩邦庆与言情小说	(056)
--------------------	-------

第三节 “礼拜六”派的崛起	(067)
---------------------	-------

第四节 徐枕亚与《玉梨魂》	(075)
---------------------	-------

第三章 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机制研究	(087)
----------------------------	-------

第一节 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087)
-------------------------	-------

第二节 中国小说创作主体审美情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100)
---------------------------------	-------

第三节 中国小说创作主体创作原则的转换	(107)
---------------------------	-------

第四节 中国小说要素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119)
---------------------------	-------

第五节 对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反思	(129)
----------------------------	-------

中篇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第四章 鲁迅其人其文的再解读	(141)
----------------------	-------

第一节 从知遇之恩到精神资源	
——重新解读《藤野先生》	(141)
第二节 人生支点的确立与文章的写作	
——以鲁迅的文章写作为例	(150)
第三节 《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	(157)
第四节 “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	
——以《山东师院学报》为例	(168)

第五章 公葬李大钊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文化生态	(180)
-------------------------------------	-------

第一节 李大钊的政治文化身份的复杂性	(181)
第二节 复杂的政治生态与李大钊公葬的举行	(184)
第三节 文化界知识分子对李大钊公葬的认同	(188)

第六章 巴金及其早期小说创作	(195)
----------------------	-------

第一节 巴金早期的疾病体验	(196)
第二节 巴金早期的思想成长	(199)
第三节 巴金早期的小说创作	(203)

第七章 丁玲及其早期小说创作	(208)
----------------------	-------

第一节 丁玲早期小说创作的独异性	(208)
第二节 丁玲早期小说的结构艺术	(215)

第八章 胡风及其七月派小说	(220)
---------------------	-------

第一节 独特的美学世界	
——胡风及七月派小说	(220)
第二节 胡风批判现实主义的三大文化支点	(228)

第九章 张恨水及其章回小说创作 (235)

第一节 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及其影响 (235)

第二节 张恨水章回小说的艺术魅力与现代性特质 (239)

下篇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理论与实践

第十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理论研究 (251)

第一节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书写的纠结与突围 (251)

第二节 “马工程”教材:挑战与回应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例 (255)

第十一章 居于选择关系中的文学史书写 (266)

第一节 选择主体论 (266)

第二节 选择情感论 (272)

第三节 选择发展论 (278)

第十二章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论 (284)

第一节 中国儿童文学概述 (284)

第二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 (287)

第十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期刊辑校 (305)

第一节 1940—1949 年《国文月刊》目录辑校 (305)

第二节 1947—1948 年《诗创造》目录辑校 (307)

第三节 1942—1943 年《世界学生》目录辑校 (308)

第四节 1938—1947 年《学生杂志》文学目录辑校 (321)

附 录 (342)

学术期刊分级制带来的问题与破解方略 (342)

核心期刊评估体系的悖论与破解方略 (356)

后 记 (367)

上 篇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

绪论 战争语境下中国文学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①

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根溯源的话,就可以发现,其转换的深远背景是战争。正是因为战争,才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并促成了新式教育的诞生;正是新式教育,才孕育出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正是这些接纳了新式教育、建构起了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人”,才成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并最终创造了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代新文学——五四文学。

—

战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人类陷入到相互残杀中,导致了社会的倒退;另一方面,战争又激活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重新思考。它以强力的方式解构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使人们不得不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调整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文学发生的这一段时间里,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战争,这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传统社会的解体,促成了新式教育的诞生;而新式教育的生成又直接为五四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储备了生力军。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发生的深远背景恰是战争,是战争这一无坚不摧的作用力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纾解现实困局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就和培养深谙西学的“人”的启蒙相联结。于是,开展救亡和启蒙运动,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共同的聚焦点,也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

^① 本文原刊于《东方论坛》2006年第4期,略有改动。

两大文学母题。

战争迫使中华民族走上了觉醒抗争之路,走上了探求强国强兵之路。这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战争对话,既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对话,又是一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展开的文化对话。毫无疑问,文化的对话离不开对话主体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支撑。这正如皮亚杰所说的那样:“认知的结构既不是在客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因为这些客体总是被同化到那些超越于客体之上的逻辑数学框架中去;也不是在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因此,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①这就是说,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认知,不可能通过一次或几次无关痛痒的战争就可以完成,只有当战争关乎到国家的存亡时,才会触及到个体的灵魂,成为解构自我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主导力量,从而在“心理发生的结果”基础上,使国人获得进一步认知的动力,完成“从一个较初级的到一个较高级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战争都在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中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事实上,这刺激也确实引起了晚清政府和国人的某些“特定反应”。这正如梁启超在1923年回眸晚清历史时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船坚炮利,“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败中,认识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天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于是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时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从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政治制度变化很大,但文化上仍是老一套,以致革命希望件件落空,后来“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②梁启超对晚清历史进化的概括,正可谓经典之论。

这三个时期认识的深化,其一与战争有着紧密的关联,因为推动这认识深化的正是战争对话,也正是战争对话激发起的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现代焦虑

①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页。

②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45页。

与社会责任,迫使仁人志士兴办教育以输入西方先进文化。其二与新式教育有关,因为正是在新式教育的引领下,人们开始了认知西学的心路历程,像学外语、学工艺、学科学、学法政、学文学(如北京大学文科所开设的欧洲文学史),这就为人们全面把握西方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建构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渠道。

战争历史的这种环环相扣的链条关系,尽管在后人眼里是可以用理论清晰地加以描述,但在晚清的士大夫那里,却因为他们把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纳入到了自我“中学为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加以解读,使“认识的结果”和对象经常相去甚远。在这一点上,我们倒不如远在西方的马克思看得更清楚。马克思站在世界化的文化立场上,以其清醒的头脑和缜密的创造性思维,指出了战争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解构作用:“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①。事实也的确如此,战争作为一种强力的介入,颠覆和解构了“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帝国存在的条件,把中华民族无情地抛到了生死存亡的风口浪尖上。这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②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中,士大夫只能在中国化视野中来解读已经世界化了的历史和现实,而中国的士大夫要想实现从中国化视野向世界化视野的转换,只有在和西方文化对话中,在“盲人摸象”式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才会感悟到西方文化之“象”的真实情形。事实上,从五四文学的发生来看,一代代的文化先驱者正是通过这种“盲人摸象”的认知方式,缩短了自我的文化心理结构与现代文化心理结构之间的差距。如梁启超在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体认之后指出,中国人不讲公德;只顾一身一家的荣华富贵,不顾国家的兴亡盛衰;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只知忠于君,不知忠于国,甘为一姓之家奴走狗;主柔好静,不尚竞争;依赖成性,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0~781页。

②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4页。

缺乏毅力;自暴自弃,自贬自损;搪塞责任,缺乏独立人格。^① 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尽管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但与马克思的认知深度还有一定的距离。在中国真正达到了马克思这样的立论高度的是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和胡适等人对国民性中的“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和“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如鲁迅就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② 无独有偶,胡适对如何真实地看取人生和鲁迅有着相似的表述:“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无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③ 这些深刻的认识,总算标志着中国社会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又进入了“世界联系的体系”之中。事实上,正是屡战屡败的战争现实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自省意识,也正是有了民族自省意识才召唤着五四时期启蒙文学运动的到来。

应该看到,民族认知上的这一大步是从战争的血与火中走过来的。战争最终使中国从一个主权独立的帝国,转变成了一个依靠西方列强的“保全中国”政策才得以苟延残喘的帝国,大清帝国从妄自尊大败落到仰人鼻息的地步。在此情景下,“亡国亡种”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宿命了。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势,不甘于沉沦的先觉者开始了他们“救亡图存”的艰难探寻。

如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正是那些仁人志士和当政的开明官僚所孜孜求索的事业。缘于这样的焦虑,培养驾驭西方新式武器的人才成为应对战争严峻形势的第一选择。但是,随着战争不断失利而来的救亡和启蒙这对孪生主题,却空前地被凸显了出来,从而成为制衡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这在奠定了五四文学的两大母题的同时也奠定了五四文学的建构方式,即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具有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人来建构五四文学。因为,那些依然处于蒙昧状态下的人无法完成这一使命,那些依然遵循着古典文学创作路径的人也无法完成这

① 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7~52页。

② 鲁迅:《论睁了眼》,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③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601页。

一使命,建构五四文学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那些接纳新式教育的学生们的肩上。他们通过接纳新式教育,除却了思想上的蒙昧,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认同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精神实质,从而把自己铸造成新型的精神个体,在“新我”的基础上孕育出“新文学”——五四文学。

战争固然是新式教育和五四文学发生的重要驱动力,但由战争到人的全面觉醒的过程注定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对于那些“尚礼义不尚权谋”^①的迂腐之论,唯一能使其文化心理结构发生裂变的便是战争。随着战争危机的加深,救亡显得更为迫切,这甚至使保守的俞樾也无法顾及儒学经典的神圣性,承认了戏剧小说在“感人深”、“移人速”等功能上,远非儒学经典所能比。^②这样的立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儒学经典的霸权地位,而这种情形在鸦片战争前后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显然,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裂变根源于战争所造成的亡国亡种的现实压迫。

正是在这样的战争语境下,洋务运动的救亡和启蒙获得了实现的可能。洋务运动首先着手的是“人”的启蒙活动。这一启蒙活动展开的次序主要是从学习外国语言开始的,如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开办的上海广方言馆等,都是以学习西方语言为主;其次是深入到技艺层面的学习,如为了掌握西方军事技术而兴办的军事学堂;再次是深入到西学中的科学知识层面的学习,如科技学堂和实业学堂都属于此列。在这些学堂中,西学中的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学科成为主要课程。如严复在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学习的科目就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力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航海学。^③最后触及到的是西学中的社会知识层面。如西学中的万国公法、外国史等人文学科,都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由此说来,学习西方的技艺和科学知识,便成为洋务运动救亡的价值归结点。所谓启蒙,就是用西学来启被中学蒙蔽之昧。因为洋务运动要救亡,便离不开深谙西学及西艺的“人”。而我们的科举制度,所培养的只是“学而优则仕”的士子,他们所孜孜为之的“四书”“五经”和西学根本不沾边,要想使这些士子成

①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第16卷),见董宝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② 俞樾:《春在堂杂文续编三,余莲村劝善杂剧序》。

③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为救亡图存的有用人才,就必须使他们接受西学的启蒙,进而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洋务运动的“人”的启蒙活动,培养了大批在政治上认同西方民主政治、反对君主专制的“人”,这实在是出乎当局者倡导新式教育的初衷。所有这些科学启蒙和政治启蒙,改变了学生既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世界的知识谱系,使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根本性裂变。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排斥“洋人”到逐渐接纳“洋人”。如严复赴英国留学前,“与‘蛮夷’教习们相处亦很愉快,这一切已在他的头脑中消除了关于西方道德、理智和精神低下的观念”^①。这就是说,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裂变的同时已经逐渐地和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相接近,这成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全面认同科学与民主的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事实上,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功绩在于:通过新式教育培育了能够和西方文化展开对话的第一代学生。这代学生大多出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属于鸦片战争后出生的一代。战争把他们这一代抛离了士子们一以贯之的人生轨迹,使之因此承接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倾向于把他们概括为19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为了行文的方便,可以径直称之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②

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既是接纳新式教育的第一代学生,还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老师。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文学运动的发生离不开洋务运动,新式教育所培育的这代学生直接启迪和孕育了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不管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不管是周氏兄弟还是李大钊,不管是刘半农还是钱玄同,也不管是沈尹默还是马裕藻,都是因为站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肩上才建构起了五四文学大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中,直接从事新式教育的人不是太多,即便是从事新式教育,也没有取得“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那样显赫的业绩。这可能与他们在著述方面取得的显赫成就有关,这些成就遮蔽了

^①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② 关于新式教育下的学生代际划分,可参见拙作《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2006年版)。

他们从事新式教育所取得的独特贡献。如严复,尽管做过教师,甚至还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对保全北京大学具有无可取代的功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著述中的理论和学生这样的接受主体的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结合起来。所以,人们依然难以把严复和新式教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严复对新式教育在理论上的贡献还是为同时代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我们甚至可以把严复和蔡元培等量齐观。严复面对救亡的艰巨任务,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教育启蒙。他把政治、经济变革当作“标”,把教育的变革当作“本”,主张“标本兼治”：“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①而求取“人才”的方式只能通过新式教育才能实现：“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②这就是说，严复看到了中学的教育方法和西学的教育方法具有质的差异，他们本不属于同一文化范畴，但严复希冀调和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去旧谋新中实现“标本兼治”的文化目标。至于严复“标本兼治”的“人才观”，对五四文学来说，亦具启迪意义，即无人才则所谓建构新型文学“皆不行”。如此说来，“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或通过著书立说，或通过办刊物，或通过出版等诸多形式参与到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过程中。不过，这批“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接纳他们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新式教育这一平台完成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们都具有相似的西学知识背景，这是他们能够实现文化心理结构对接的一个重要前提。如严复在新式教育下所学习的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知识，和二十年后鲁迅所学习的物理、化学、数学并没有什么二致；其二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著述时，依托的是学校这一特定的物质空间。也就是说，学校在当时除了具有直接传授西学知识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接纳西学知识的功能，离开了这一特定的物质空间，他们的著述既不会进入“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文化视野，更不会成为其接纳的对象。

总之，洋务运动成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文化心理结构发生变异的远因，对后来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起到了无可取代的历史作用。这正如陈旭麓在评价洋务运动时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

① 严复：《拟上皇帝书》，见《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页。

②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①我们在此借用陈旭麓的话来评说洋务运动对五四文学发生的作用时,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学产生的冲击,比十次旧式文学变革都要大。

二

战争既是推动着人们既有文化心理结构发生变异的动力,也是修正人们既有文化心理结构认知偏差的动力。甲午战争中的中日交锋,就是促成人们既有文化心理结构变异和修正的重要冲击力量。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认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②然而,战争交锋的结果是什么呢?“螳臂挡车”者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被“摧枯拉朽”者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甲午海战,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对此,梁启超说过:“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③

客观的情形是,不管苛刻也好,耻辱也罢,割地赔款是无法回避的宿命!这不能不给国人封闭自大的文化心理结构以重创,迫使人们思考日本为什么会战胜“强大”的中国,这使人们注目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变法实践。对此,历史学家蒋廷黻在阐释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这样认为:“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④这实际上隐含了这样的文化命题:中国要救亡图存,就要走日本人的道路。

与甲午战争相比,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輿播荡,神京陆沉,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者也。”^⑤这就使慈禧太后所谓的颜面和尊严在庚子事变中荡然无存,也最终促成她祭起了变革的法宝。这种情形在“上谕”中显示得格外清晰:“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总之,法令不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③ 梁启超:《改革起源》,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页。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⑤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

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①由此可见,这一挟皇太后余威而发出的上谕,不仅显示了激进的变革姿态,而且还显示了晚清政府励精图治的宏大决心,这为西学东渐提供了强力支持的同时,也起到了横扫守旧势力阻挠的效力。所以,慈禧太后顽固思想的开化对解构人们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对此,国外学者认为,“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 1949 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②晚清新政中的废除科举和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使原来那些被看作康梁逆党所提倡的乱国之策,却挟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话语,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性话语,这就使五四文学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等话语,在晚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表达空间。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思想解放新时期。

在晚清新政推动下的维新浪潮,根源于迫在眉睫的连年战争带来的救亡情势。而要救亡,就离不开启蒙,这就又把新式教育的作用进一步凸现了出来。“甲午庚子以还,内为志士所呼号,外受列强之侮辱,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③正是在这众口一声的民间呼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合下,新式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正如上谕所宣示的那样:“时经大创后,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图补救,乃以决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外。”^④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促成了人们救亡情结的进一步凸现。正是在对相似的国家道路的对比和认同中,人们开始了对国民性问题的探寻,这使“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把目光聚焦于“人”的国民意识的启蒙上。对此,梁启超认为,战争中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我国“民德、民智、民力”之不足,他们徘徊观望,把希望寄托在“一二贤君相”身上,而不知自己起来争取和保卫自己的权利。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⑤所以,梁启超以“新民”为当务之急。那么新民用什么来“新”呢?在梁启超看来,就是要用西方的政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4601~4602 页。

②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6 页。

③ 钱曼倩、金林祥:《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7 页。

④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

⑤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 页。